



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 张新斌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和根和魂。黄河文化是指古今黄河流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总和。了解黄河文化的历史形成与丰富内涵、挖掘其时代价值，对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有着重要意义。

从流域变迁看黄河文化的区域组成

常义的黄河流域，就是当代黄河流域所涉及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由于黄河的特殊性，自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共决溢1590次，较大的黄河改道26次。广义的黄河流域，除包含当代黄河流域所涉及的九省区外，还包括古代黄河改道涉及的地区，如北流涉及河北、天津，南流涉及安徽、江苏等，构成广阔的地理空间。所以研究黄河文化，实际上包含了黄淮文化，以及以历史上“四渎”之一济水为代表的“河济文化”，这些共同形成了世界大河中少有的“大黄河”现象与独特的“黄河大文化”。狭义的黄河文化，依托的是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是以西安、洛阳、郑州、开封，以及安阳等大古都为代表的古代文明核心地区，代表了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因此，我们通常所研究的黄河文化依托的是常义的黄河流域概念，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黄河文化所依托的黄河区域还应包括古代黄河故道保留的相关文化史迹，重点是以陕西、河南所保留的古代大古都为代表的核心区域的文化。

因此，黄河文化实际上是由若干区域文化组成的，主要包括黄河上游的河湟文化、黄河中游的关中文化和河洛文化、黄河下游的齐鲁文化等。

河湟文化，是指在黄河上游黄河与湟水河交汇区域形成的，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各种宗教文化交流为特点的区域文化。关中文化，是指在黄河中游黄河与泾渭河交汇区域形成的，以宝鸡、咸阳、西安为中心的周秦汉唐大古都为代表的区域文化。河洛文化，是指在黄河中下游黄河与伊洛河交汇

区域形成的，以洛阳、郑州、开封为中心的夏商周汉晋魏唐宋大古都为代表的区域文化。齐鲁文化，是指在黄河下游泰沂蒙地区古代齐鲁两国范围内形成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特色的区域文化。除此之外，还有宁夏交汇地区的河套文化、山西南部的河东文化、太行山与黄河夹角地区的河内文化、河济之间的河济文化、黄淮之间的黄淮文化等，这些反映出黄河文化是由数量较多的区域文化组成。

从历史发展看黄河文化的主体内容

农耕文化是黄河文化的基础。黄河流域因其所处纬度与地形阶梯，形成了其特有的农耕文化特色。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旱作农业的主要发生和发展区，旱作农业以粟、黍、稷、麦等为代表。当农耕定居生活稳定之后，磁山—裴李岗文化便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物，而且还发现了制作精致的长条形石铲、琢磨兼制的石斧、锯齿状石镰，以及石磨盘棒等农耕工具。仰韶文化则出现了制作精致的与农耕定居生活相适应的精美彩陶，以及各类石制农耕工具。龙山文化则出现大量精致的酒器，反映了农耕收获盈余之后还将粮食加工成美酒。进入文字出现后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逐渐出现了以桑麻、丝绸等立足于农耕种养加工基础上的重要生活创造，形成了对黄河中下游长期气象观察而归类总结的“二十四节气”，诞生了以精耕细作为主导的农耕技术体系、农业灌溉体系，实现了农耕工具由石器直达铁器的“革命”，实施了井田制、以农民为根基的士农工商制，以及支撑国家发展的赋税制度体系等，这些黄河流域的文明产物，使中国农耕社会的时间长度、繁荣程度，在古代历史上均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都城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自夏商周开始，历经秦汉唐宋，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始终都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洛阳先后为夏朝、商朝、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十三朝都城，为中国大古都东西轴线的轴心。西安古称长安，是西周、西汉、隋、唐等朝都城，加上属于西安大都

会一部分的秦都咸阳，构成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曾是世界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会。郑州和安阳分别是青铜文化顶峰的商代早期都城（郑亳）与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开封为北宋时的都城，也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会之一。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上古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其文化不仅是地域文化，更是当时的中央文化或国家文化，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度文明。这是黄河文化与其他地域的河流文化的最大区别。

精神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魂脉。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伏羲所创立的以“河图洛书”为载体的太极理论，形成了阴阳二元思维模式，这也是河洛文化的重要贡献。文王演周易，直接催生了《周易》理论的诞生，是中国文化的直接源头，由此形成道儒法等诸子学说。无论是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还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社会规范，以及由法家而来的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的担当，这些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精神塑造具有深远影响。此外，被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和文化记忆的汉字，也是源于黄河流域。汉字不仅是思想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而汉字最早的完备体系，就是以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甲骨文，其源头可追溯到八九千年前河南舞阳的贾湖刻划符号，以及仰韶、大汶口、龙山出土的大量刻画符号。

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与时代价值

千百年来，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和奋斗精神。黄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黄河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其精神特质至今仍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均衡和谐，是东方哲学思想的重要理念。由天地人“三才”的协调，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均衡，无不体现了古今崇尚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中国哲学中无论儒道，都强调这种整体理论，并将这种阴阳均衡，以居中的思考来寻求所有

事情的平衡与不偏不倚。当今中国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生态环境的“大保护”意识，均来源于中国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而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是中国古代先民依托黄河特定环境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黄河干流的重大景观，展现了黄河所体现的精神内核。无论是“几字大湾”蜿蜒曲折、勇往直前的精神，“壶口瀑布”大气磅礴、不畏艰险的精神，还是“鲤鱼跳龙门”逆流而上、奋进向上的精神，以及由“三门”直抵“中流砥柱”的不惧急流、不怕牺牲的精神，均对中华民族的品格塑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黄河流域广为流传的元典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先民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以应用技术为主兼顾科学原理的大科技体系，形成了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天象物候体系，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应用科技体系，以陶瓷丝绸茶叶为代表的生产技术体系，成为古代王朝盛世的重要代表，也为人类不断进步作出了“中国贡献”。而这种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正是引领时代发展的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

而以厚实黄土、奔腾黄河为地理背景所形成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民族品格，为多样的族群、多彩的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和包容的胸怀。这种包容是立足于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包容，是敞开心怀相互欣赏的包容。黄河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塑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文明体，当今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包容精神的重要体现。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全力提升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整体效能

《决定》提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有力保障。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必须优化整合绿色资源要素，更好集众智汇众力，以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

聚力构建责任体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自然落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考核的具体举措，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现多方联动、良性互动、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聚力构建监管体系。强化监管是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和有力手段。必须把严的基调和问题导向贯穿始终，建立生态问题诊断、实施治理、监测评价、成效评估、后期管护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和生态环境“大脑”，完善全域生态环境问题发现和跟踪治理长效机制，强化常态化监督

管理和问责，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当好“生态卫士”，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聚力构建市场体系。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既需要政府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主体不断创新发展。必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引导资金往高地投、项目往高地引、政策往高地落、人才往高地走。

聚力构建法治体系。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必须以法治护航生态，认真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加强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低碳转型等地方立法，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制度重塑、流程再造、综合集成，立良法、促善治，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踏上新征程，我们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坚持以改革创新之举、久久为功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书写好绿水青山间的生态答卷，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靓、绿色发展“气质”更纯，坚定扛牢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历史责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红十字会，作为国际知名的人道主义组织，起源于1863年在瑞士成立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76年改称现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于19世纪晚期传到中国。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迄今已走过120年的风雨历程，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人道组织。作为舶来品，红十字会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又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的呢？

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与“三个一”分不开：一个人、一场战争、一本书。一个人，即被称为红十字运动之父的亨利·杜南，一场战争即索尔弗利诺之战，一本书为《索尔弗利诺回忆录》。

亨利·杜南1828年5月8日出生于瑞士，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和商人。1859年6月25日，他在意大利商业旅行，途经卡斯梯哥里昂镇附近的索尔弗利诺，目睹了一场惨祸——法、意联军和奥地利军队鏖战厮杀刚刚在这里结束，4万多死伤士兵被遗弃战地。杜南见此惨状，立即组织当地医生乃至妇女、儿童，进行力所能及的救治。10天后，杜南回到日内瓦。那段“不愉快的往事”激发他去“完成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事业”。他开始撰写《索尔弗利诺回忆录》。1862年11月，该书在日内瓦出版后引起轰动。书中对那场血淋淋的屠杀细节的真实描写，在人们心灵深处产生强烈震撼。在书中，杜南提出两大设想，“能否成立人道主义组织？能否制定人道主义公约？”后来，他的设想成为现实，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

1863年2月9日，第一大设想实现——“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由杜福尔将军任主席，委员有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医生、莫诺瓦医生和杜南（兼秘书），史称“五人委员会”。1864年8月，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共同发起，在日内瓦召开有瑞士、比利时、丹麦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通过了史上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即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其在武装冲突中的特殊作用，正式得到国际公约的承认。杜南第二大设想实现。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会议选择了与瑞士国旗颜色相调的白底红十字符号，作为救护及保护性标志。这就是“红十字”标志的由来，红十字运动由此蓬勃发展起来。

1901年，因为对国际红十字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亨利·杜南被诺贝尔委员会授予首个和平奖。这项崇高的荣誉，他当之无愧，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赠言所说：“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这一荣誉，因为是您在前40年前发起了在战场上救护伤兵的国际组织。没有您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取得‘红十字’这个19世纪最高无上的人道成就。”1910年10月30日，亨利·杜南逝世，终年82岁。而此时，他开创的红十字事业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1948年，他的生日被正式确定为世界红十字日，这便是“五八”世界红十字日的由来。

“红十字”在中国的启蒙。近代以来，红十字开始“登陆”中国，但其在中国的“着陆”并非一帆风顺。这需要一场“红十字启蒙”运动加以推动，即红十字组织形式以及人道、博爱的核心价值观被国人认知、接纳并付诸实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近代大众传媒的“新”媒体——报纸，成为最重要的载体。

早在1874年，《字林西报》《申报》就开始将红十字的理念介绍到中国。1874年5月，日本在中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冲突，《字林西报》就战争救护问题发表评论，非常推崇红十字会的中立性原则。《申报》对《字林西报》的时评表示赞赏，认为这种救护组织“不分彼此，设法治伤，此亦仁义之行也”，希望中国加以效仿。遗憾的是，两报的评论都没有直接提“红十字”三字。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知道“红十字”究竟是什么。

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在华的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先后在营口、烟台、天津等地开办红十字医院，收治伤员。为了提供后援保障，旅沪英国传教士、驻沪总领事以及洋商，在上海成立红十字会，筹款募捐、提供后援保障。有识之士以《申报》为载体，陆续发表《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会约》《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一系列文章，对杜南开创红十字运动的业绩、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中国创建红十字会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作了合情入理、生动服人的论说。文章指出，红

红十字会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 池子华

十字会具有中立性，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红十字是国家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申报》的宣传鼓动，将红十字启蒙运动推向深入。

除《申报》之外，《集成报》《时务报》《岭学报》《万国公报》《政艺通报》《外交报》等报纸，也都有相关文章发表。正是这些“新”媒体的推动，红十字文化在一定范围尤其在东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为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设奠定了社会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启蒙宣传和实践探索，1904年3月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兴已是水到渠成。

“红十字”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之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谱写出一曲曲人道主义赞歌。“红十字”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历久弥坚？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道主义是能够凝聚不同文明的最大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相融相通。”

中国是“仁”的国度，所谓“仁者爱人”，其实就是博爱。孔子的“泛爱众”是博爱，墨子的“兼爱”同样是博爱。按照墨子的话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这些都是对“仁”的最好诠释。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博爱之谓仁。仁就是博爱，博爱就是仁，仁与博爱，‘仁道’与‘人道’虽然名称不同，但对博爱理想的诉求并没有本质区别。

有趣的是，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一进门就有一块用隶书书写的警示牌：“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恕道’被视为红字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更能说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仁爱’与红十字会秉持的人道博爱精神有共通之处。正因为如此，当博爱文化以红十字会为载体远渡重洋‘登陆’中国，便迅速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对接与融合，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

因为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仁爱”观念深入人心，中国早已形成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的仁爱传统，激励着历代国人乐善好施。因此宋明以来，安济坊、孤儿院、栖流所等慈善机构数不胜数。这些慈善团体，敬老助残、抚孤育婴、济贫救难，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水平不断推向新的高度。浓郁的仁爱慈善氛围，为红十字会落地生根创造条件。红十字会之所以在中国找到生长点并不断发展壮大、欣欣向荣，毫无疑问得益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慈善文化传统。

（作者系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

